

1961年,谢晋导演的一部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风靡一时,剧中的琼花和十岁便与“木头人”结婚的连姐一起参加娘子军的经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电影中并未介绍娘子军的成立经过,这支队伍是如何成立的呢?这百余名巾帼英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遭遇了哪些腥风血雨?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围剿,她们在撤退途中遭遇如何?解散后各自的状况又是怎样的?



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剧照

红色娘子军原型 鲜为人知的人生结局

从“赤色娘子军”到 女子特务连

看过《红色娘子军》的人都知道,影片中有一位在行军途中生下小孩的女战士,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王运梅。尚健在的王运梅回忆说(由其外孙女马世菊转述):“当时家里很穷没饭吃,女孩子地位又低,男人可以有书读或参加红军,我也想这样,于是就报名参加参加了娘子军。”

顺利入伍后,部队给每人配备了一套军服,还都剪了短头发,周围人都称她们为“红军哥”。“入伍时我知道这支队伍是要打仗的,但也没感觉害怕,只知道被枪打中了才会死,打不中就不会死。”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长庞启江说:“当时报名要求入伍的女性共有七百多名,最后筛选出了一百名左右的报名者,这些女性大多是来自穷苦农村家庭。”

中共琼崖特委将“赤色娘子军”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(即红色娘子军连),由当时的海南琼崖师部直接领导,全连分为三个排,王时香任指导员,庞琼花担任连长,冯增敏、庞学、黄嫩英分别任一、二、三排的排长。

女子特务连成立后接受了完全军事化的训练,“阿婆精神好的时候会把拐杖当作步枪,敬礼、拿枪、托枪立正,一套动作下来看上去仍然十分标准。”王运梅的外孙女马世菊说。原先这支队伍的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、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,然而随着战斗形势的变化,她们很快投身到战斗中。

刚出生的孩子在行 军途中夭折

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围剿,女子特务连在撤退途中遭遇如何?这在电影中并未详细展现,王运梅回忆了她经历的过程。

1931年6月,琼崖红军决定消灭乐会县的国民党“剿共”总指挥陈贵宛部队,女子特务连奉命配合红三团和赤卫队的诱敌战术伏击沙帽岭,“我们女子军当时从沙帽岭的山沟中进行,国民党部队见到我们的队伍都是女子军,一边率部急追过来,一边大叫道:‘那是女的,不要怕,不要怕,活捉她们,谁捉到归谁。’”王运梅说道。

女子军边开枪边后撤,佯装败退,敌方很快被引诱到伏击圈,埋伏在一旁的红军主力趁机发动猛攻,对方猝不及防,乱作一团,不到一小时就被击溃。随后,女子特务连又在火烧文市炮楼战斗中,活捉了恶霸“冯朝天”(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中“霸霸天”的原型之一)。

几场战争下来,女子特务连声名鹊起,许多女性纷纷要求加

入,1932年春,琼崖特委决定扩编这支武装队伍,女子特务连新增成2个连,共有140多人,娘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拔除了乐会、琼东、万宁、定安、文昌五县的多个敌据点。

1932年8月,国民党的警卫旅陈汉光率领大量人员再次围剿琼崖革命根据地,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局势,琼崖红军决定将部队再次向母瑞山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,队伍开始了艰难的行军。

怀孕的王运梅在跟随大队行至母瑞山附近时突然分娩,女战士们找来树枝、山葵叶、芭蕉叶搭成临时产棚,王运梅的儿子顺利出世。为逃避国民党部队的追击,第二天,王运梅就抱着孩子和战友们继续前进。部队从马鞍山撤往母瑞山的途中非常艰苦,因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,战士们早已断粮,王运梅回忆称:“晚上又冷又饿,从马鞍山到母瑞山的路很不好走,我和战友们光着脚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,脚底被山间碎石扎得多处流血,路边的树上、齐人高的草丛中有许多山蚂蝗会冷不丁地落到身上吸血,一路上由于疲劳,蚂蝗有时叮在嘴边吸了很久都未曾察觉。”因缺乏营养,加上行进途中的恶劣环境,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在她的怀里停止了呼吸,连父亲也没来得及看上一眼,“小孩尸体被掩埋在一棵树下,不过后来很难找到具体的位置,老人至今仍不能释怀。”马世菊说。

形势所迫,女子特务 连只得解散

琼崖红军部队遭到国民党大量军队的“围剿”,两军在马鞍山交战,因敌众我寡,琼崖红军主力作战失利。为掩护部队后撤,红色娘子军一连奉命留下一班10个人与红军一营在马鞍山进行阻击,“这是一场惨烈的阻击战,娘子军和红军战士们一直坚持到最后,子弹打完后,她们就退到山坡高地用石头砸,娘子军10个人最后全都牺牲了,红军战士也伤亡惨重。”庞启江说。

马鞍山一战后,国民党陈汉光旅又调集大量兵力继续围剿,女子军成员陆续有一部分英勇牺牲、失散和被捕。庞启江道:“根据现有的资料了解到,女子特务连解散之际,在战斗中牺牲的成员共有19名,还有不少人员在撤退途中失散。”面对国民党部队逼近,海南琼崖特委总部决定让剩余的娘子军化整为零,分散隐蔽,女子军连被迫解散。1932年至1933年春,在国民党反动派的“围剿”下,琼崖红军队伍基本被打散,各级党组织都遭到破坏,最后走出母瑞山的只有几十人。1933年2月前后,女子军连排干部的8名人员不幸被捕入狱,后被押往广州监禁,抗日统一战线形成

后,她们才得到释放。

红色娘子军纪念馆建成后,王运梅同两位姐妹便住在这里(潘先英、卢业香因身体不好在家休养)。已经102岁高龄的王运梅并没有闲下来,她目前在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馆义务担任“讲解员”,向前来的游人介绍“女子特务连”的事迹。

解散后队员鲜为人 知的遭遇

女子特务连被迫解散后,女队员们的遭遇如何?

王运梅回到家乡时,国民党正四处搜捕共产党,她不敢回家,只好藏在亲戚家。“国民党反动派有几次半夜闯进家里威胁外公要人,那段时间阿婆过得特别艰辛,今天藏这里,明天藏那里。直到抗战前后家里人才将阿婆接了回来。”马世菊说道。

1933年王运梅的丈夫为躲避抓捕逃往南洋,后来他听说家人已被迫害,就一直没回来。“阿婆对外公很专情,中间有几次来人托媒劝她改嫁,可阿婆一直不理睬。她经常把外公的照片拿出来看。1973年海南刮强台风时,我去外婆家时,远远地看见阿婆一手拿着我和弟弟的衣服,另一只手紧紧地拿着一张外公的照片,旁边是已经完全倒塌的房子……”这场景深深地印在马世菊的脑子里。

庞启江介绍说,当时农村女性受封建压迫比较严重,女孩子从小就许配给人家,15岁就生孩子,25岁前若还没有结婚,家里的族谱会把她的名字除掉,被逐出家门。几位被抓的女子特务连干部从监狱中回来时年纪已大,她们回来时已经二十六岁了,家里人都逼着她们嫁人。“但你能嫁给谁呢,嫁给共产党员的话无疑就暴露了身份,国民党马上就会来抓人。根据当地的风俗,农民等一般的家庭不可能答应娶这个岁数的姑娘,她们没有任何选择,当时有可能的就是国民党、团兵这些有势力的人愿意娶她们。”庞启江道。

女子特务连的首任连长庞琼花出狱后嫁了人,丈夫是个文化人。日本人在她的家乡修炮楼,建立维持会,庞琼花的丈夫因拒绝担任维持会会长被日军杀害,日军军官看上了长相漂亮的庞琼花,庞琼花死活不肯,躲到几十里外的深山,但还是不幸被日军发现遭到杀害。

冯增敏出狱后不久,嫁给一位红军士兵,怀孕后丈夫不幸战死战场。她义无反顾继续上山寻找党组织。于是,冯增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娘子军连唯一一位党的妇女干部——琼海县妇联主任。1958年她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,毛泽东还赠送给她一支全自动步枪。 张映武《广州日报》

《永乐大典》“戏字本” 秘密藏身银行数十年

叶恭绰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之前,曾赴欧洲考察实业。即将归国赴任的1920年某日,他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闲逛时,意外发现了一册《永乐大典》的零本。

他随手翻阅,这不是一册普通的古籍,姑且不说《永乐大典》本身的价值,这册零本竟还是专门的“戏字本”,其中辑录的戏文均是闻所未闻的古本。本身也是收藏家的叶氏,凭借多年的阅历,感到事关重大。他迅即购买了这一册古籍,不久就将它带回了北平……

北平图书馆发现副本

回到北平之后,叶氏到北平图书馆对这本标明为《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》(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内府重写本)的古籍进行了查证。结果惊奇地发现,北平图书馆里也没有收藏这一卷《永乐大典》,图书馆曾专门派人抄录了一份副本留存。他为之感慨道:“此仅存之本,诚考吾国戏剧之瑰宝也。”

十年后,1930年春,继鲁迅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的马隅卿,听闻了关于这本古籍的神奇传闻,立刻赶往北平图书馆一窥究竟。马氏此行,并非普通藏书家搜奇探宝式的一饱眼福而已,他是代表“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”,来寻访可资校印流通、学术研究的珍罕古籍。就在一年前,1929年,他与友人发起“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”,刚影印了日本内閣文库所藏的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。经过一番考察,马氏认为此书的发现意义重大,迅即表示,将以北平图书馆的抄本为底本,校印出一部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来。

1931年5月,由沈尹默封面题笺,钱玄同扉页题笺;钤有“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”版权章的,一册大十六开精白纸线装铅印的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翩然而世。

这本书的印制之精良,是远远超过此前的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影印本的。即使是用于刊印的铅字字模,也选用了由印书、藏书名家董康主持的百宋印书局专用字模。这套字模是以董康收藏的宋版《龙龕手镜》中的字体摹刻翻制,其制作之精可想而知。这套字模分“北宋聚珍版”与“南宋聚珍版”两种,而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的印制,恰如其分地选用了“南宋聚珍版”字模,无论是字体本身的清秀疏朗,精致悦目,还是字体风格正好符合书中所辑南宋戏文的风范,这样的印制水准多少还是有点再造“善本”的意味。此外,无论从纸张、开本以及名士题笺的郑重其事来看,这都是继叶氏在英国发现原本之后,在中国衍生出来的第一部可资学者们方便利用的优良底本。

后人猜测,未能影印 原本是为控制成本

据说,叶恭绰从英国带回《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》之后,因其珍贵难得,不久便将其存入天津某银行保险柜中秘藏。

有一种猜测认为,之所以未能影印原本,是马隅卿等人可能根本未能联络到叶氏本人,或者直接被叶氏拒之门外。但这种猜测也随着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的印行不攻自破,因为在书后的跋文中,叶氏明确提到了他“亟愿此书流通”,“影印姑待他日”。

那么,马氏等人未能影印原本,而代以铅字排印的校印本,则只可能是一方面限于资金有限,且原本篇幅较大,全部用珂罗版影印实施困难;另一方面采用铅字排印的方式,成本相对较低,也便于校正,对普通学者而言更具使用价值。在这种情势下,尽可能使用好的纸张、采用大的开本、选用优美的字体,还是可以令后世读者颇感赞赏的。就这样,一部旷世孤本结束了在海外的多年漂



叶恭绰

泊,在众人的合力推动与精心筹划之下,终于在其发现之后十年,以铅字排印的方式,飞入普通学者与读者的视野之中。

此书印制后不久,迅即引来众多学者购藏与研究。傅惜华就曾购过一批,除了自己留用之外,他还不忘四处赠送师友。凡经他赠送的,均在正文页首下角,郑重钤上“傅惜华持赠”的专用印章。其中一册赠与词学大家唐圭璋,唐氏读后大加赞叹。

傅惜华与唐圭璋的重视与赞叹,从一个侧面反映着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即将开启的学术时代之来临。这样一本“奇书”,如此精良的印制,如此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与重视,也必然亟须学者们对其价值的再发现与重新定位。诚如叶氏在此书跋文中所说:“至此书内容一可考传奇乐府嬗变之迹,二可考其时习用语言。是在专家探索引申,无待赘述。”又如以“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”的名义所作的附记中所称,“它的内容,在戏曲史上的地位,是不亚于董解元的《西厢》和无名氏的《刘知远》的。现在已经有人做精密的研究,不久就可以见到论文。这里不提了。”

叶氏提到的“嬗变之迹”与“习用语言”之探索,印行会所称的“有人作精密的研究”等等,虽语焉不详,但似乎已经提前预告,这本书的面世,将在学术界引发新的思潮与新的研究方向。的确,之后不久,一场“南戏大发现”的学术新潮就汹涌而来,一批因“南戏”而涌现出来的学术新人,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屡发新论、屡开新风。

孤本不知下落,数十年 后惊现台湾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,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。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发表《〈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〉的再发现》论文,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:《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》,即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现藏于台湾“中央图书馆”。这册叶恭绰曾秘藏于天津某银行保险柜中的孤本,因抗战爆发、时局混乱而不知下落。抗战胜利后,这册孤本再也没有露面,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已经佚失。时隔数十年后,这册孤本却神奇般再次发现于台湾。这发现之后的再发现,于海峡两岸的“南戏”研究者而言,无疑是天降奇缘,其中的惊喜与振奋,无不让人心潮澎湃、感动莫名。

肖伊绯《北京青年报》